

S004121
故宮季刊特刊第一集

慶祝蔣復璁先生七十歲論文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出版

K206-53
832

S 004121

故宮季刊特刊第一集

慶祝蔣復璁先生七十歲論文集



S901273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出版

故宮季刊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

譚旦問（主編）

那志良
吳玉璋
李霖燦
汪繼得
昌璞
沈鑑
周景
沈才藻
江兆申

故宮季刊特刊第一集

慶祝蔣復璁先生七十歲論文集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出版

編輯者 故宮立故宮博物院
博物院

發行者 故宮立故宮博物院
博物院

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士林外雙溪

出版者 中臺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臺灣臺中公園路三十七號

文字版排版印刷者 興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臺灣臺中忠孝路六十四號

圖版製版印刷者 興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目錄

宏揚詩教與文化復興	盧元駿	一
明天理滅人欲辨	趙雅博	一
古代之氐羌	陳槃	一五
釋築	勞榦	三五
釋畝量	魯實先	四一
告子可能是儒家	陳大齊	五五
記朱子之校勘學	錢穆	六五
金陵懷古	張其昀	八一
聖奧斯定的歷史哲學	羅光	一一七
明史考證攢逸糾謬	黃彰健	一二五
明成化處州府志纂修考	宋晞	一五七
戰國時代の銀錯文鐵壺・魏晉時代の龍虎蓮花紋銅壺之金造耳飾	梅原末治	一七五
研究玉器之圖籍	那志良	一八七
論巴黎藏石室寫本銜名殘葉之價值	蘇瑩輝	一〇三
跋宋刊本劉賓客文集	昌彼得	一一一
明皇會棋圖	李霖燦	二二九
高昌華化文士與元季畫家之交遊	莊申	二三七
中國古瓷整理與研究	索子明	二三九

論文集

二

哥窯質疑	譚旦閭	一五三
由坤寧宮得到的幾種滿人舊風俗	莊嚴	二六一
蔣慰堂先生七十年表	昌彼得	二七三
中國山水畫結構之分析（英文）	方聞	英文版 1
安岐之墨緣彙觀（英文）	羅覃	英文版 13
上下形檢字法	林語堂	英文版 13

宏揚詩教與文化復興

盧元駿

一、詩的功用

文學是具有感化力量的，特別是「載道」之文，尤其是如此。而在文學作品中，詩又是最能動心絃的樂章。每當朗誦一首優美的詩篇底時候，本來我們的心緒是粗暴的、浮燥的；但詩的旋律，卻從容的在無形中將它調整得非常平貼與柔軟了。每當我們低吟一闋哀怨的慢詞的時候，本來我們的情意是平淡的、舒適的，但詞的音色，卻在短時內激盪起了他的抑鬱與嗟嘆！這樣的感觸，這樣的體驗，我想凡是愛好詩的人士都會同聲承認，而贊嘆著詩之感人之深，竟到如此的地步！所以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曾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所謂興、觀、羣、怨，便是說詩具有這幾種境界的感化力量，而使讀者的情緒，乃至於言談舉止，完全爲它所操縱，所轉移了！因爲詩已引起了讀者的性靈，吸住了讀者的觀感，激發了讀者的同情，迸出了讀者的哀怨，這時如欲其情意與言行不受詩的支配，試問如何能做到？所以晉人王袁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見晉書王袁傳），而南朝顧歡亦因早孤，讀詩至此，輒執書痛泣（見南史顧歡傳）。二人的門人，也因爲不忍見老師的哀痛，竟從此廢讀蓼莪之篇。至如王敦一面歌著魏武帝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面以玉如意敲著唾壺，而在不知不覺之中竟將玉壺敲碎，亦可見其内心所受的感動之深了。蘇軾被謫黃州，夜飲東坡，歸時已三更過後，敲門不應，倚杖聽濤，當他看到「夜闌風靜縠紋平」，想到自己軒坎的身世與激變的時代，不禁要「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這些故事，都是在說明千古以來，偉大的詩篇，它感人之切，動人之深，誠有不是凡人的思想所能到的境界。

詩既然對個人具有這樣的感動力量，於是個人所組成的社會與國家，亦不能超脫的，也要受到詩的感染；這道理

是非常明顯的。因為詩既有感人的力量，所以每當詩人有所感於世俗與時政的時候，便發之於鏗鏘和美的篇章，有時出諸正言，有時寓於諷諫，遇著時休政和的時候，也不禁從內心發出謳歌贊頌之辭，使人聞之而畏，聽之而警，誦之而歡欣鼓舞的，不正是詩因能感發而蔚成的功用麼？所以毛詩正義序上說：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艱，亦怨刺形於怨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

鄭玄詩譜序中也說：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於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矣。有夏承之，篇章泯，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

從上面所引的正義與詩譜序的文中，我們已對詩的作用有了詳明的瞭解，那末我們觀詩，便正所以觀俗觀政，換句話說：欲知道一個時代的風俗厚薄，政治良窳，便只要觀察這個時代的詩底趨向以爲斷，所以詩譜序上又說：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譜，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卿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此由可見，整個一部詩經的三百零五篇，其所反映的幾乎都是西周初期——約在公元前一一二三年到春秋中期——約在公元前五七〇年，這五百多年長時期的社會、政治興替的史實。那末要觀察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的情況，經由詩的角度去探望，是最能得到它的底蘊，自是顛撲不破的道理了。吳季札在魯聽樂的故事，這是人所熟知的，葉楚僊先生在他

所著的「文史與興亡」一文中，有這樣的說明：

「春秋時代的吳季札，觀了各國的歌樂，就可以判斷某一國將來一定要興旺，某一國一定要滅亡，某一國的人民困苦艱難。他的判斷與所得的結果總是差不多。譬如他說秦國要興旺，陳國要衰亡，結果果然不錯。由此可見文學與音樂，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來的。」

這裏所記吳季札雖是觀樂，實際這樂章裏所歌的就是詩篇。左傳所述觀樂論及秦、陳之興替的原文是這樣的：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後來秦國果然統一六國，代周而有天下，而陳也竟先爲秦國所滅了！一個時代的詩的趨向，謂之爲是同此時期的世俗、時政的氣候測驗站，誠不爲過。

總之，詩是可以感人的，更可以感染一個時代的風俗與政治。因此我們從這個階段的詩篇裏，可以察出這個階段風俗，政治的得失興衰。那末進一步說：我們如要振興一個階段的風俗與政治，詩自然更是具有最大的決定性的。這便是詩的功用，詩的最偉大的功用！至於孔子曾說：「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見陽貨篇）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見論語子路篇）以及認爲學詩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那只是詩之功用中的餘事了！

二、詩與文化

詩的功用，既然是個時代社會風俗與國家政治的反映與測驗；而社會風俗與國家政治卻正是這個時期文化的具體表徵；那末我們是否可以說：詩的功用，便是這一個時代文化的反映與表徵呢？不錯，我們誠然可以這麼認定，試將詩經這部書的內容和他的時代背景加以分析比照，便可得着明顯的證例。

中國脫離野蠻應該在殷商之末，到了西周初年，便進入文明的時代了！王國維在他所著的「殷商制度論」中說：

「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面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昏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團體。」（觀堂集林卷十）

王氏在這段文章裏所舉出的西周時期比較殷商時期所特別形成的各種制度，正是西周文化的昇華與結晶。自此時起，由於人民生活的日趨安定，情感的日趨複雜，思辨的日趨發達，理想的日趨豐富；於是社會基礎便日臻鞏固，民族文化便應運乘時而起。我們試聽聽成、康時代的頌聲，我們又試聽聽厲、平時代的怨懟，這些謳吟之作，便終於蔚成了這一部萬古長存的三百零五篇的詩經。詩經！這一部我國最悠久、最偉大的製作，它誠是有周一代的政治、社會、宗教、倫理、道德……所熔鑄而成文化固體——歷數千年而不可磨損的固體了！

六經原是我國民族文化的靈魂，這是人人共知共信的事實；但我們更知道，詩經實居六經之首。可見詩經與我們固有的民族文化的關係，是如何的深切了！自此而後，歷代的詩，自然也就成為歷代文化中心。以唐代而論：唐代不僅武功之盛，文化的發達也是極其蓬勃有象的。但唐代文化為什麼會如此發揚？我們可以說：就是代表有唐一代的偉大的詩篇去作動力。唐承六朝衰敝之後，有識之士，相與振厲雄風，以圖挽救，成為時代觸角的詩人，便首先敏感到此；於是大家拋棄了六朝時代的靡靡之音，而度出了雄渾壯闊的篇什。李白、杜甫的氣魄，誰都知道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因其時有如此傑出的詩家偉大的作品，遂推動了唐朝的時代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到後來，詩的氣味漸漸的式微，唐朝也就由弱而歸於滅亡了！近人葉楚僉先生在他所著的「文史與興亡」一文中說：

「到了唐朝，大概可以分做三期：盛唐、中唐與晚唐。盛唐的詩，都有一種雍容大雅的氣魄，所以當時產生了一位唐太宗，造成了這一時代民族的政治、民族的武功。那時的詩，很有發揚蹈厲的精神。到了中唐的時候，祇有一個杜甫，他想把盛唐時代國家民族的精神發揮起來的；但其他的文人，都留戀於山水風景，所以自從安、史之亂

以後，雖有唐肅宗能够恢復他們姓李的國運，但是維持不了唐太宗時國家民族的聲威。到了晚唐的時候，更是不行了！完全把盛唐的精神失掉了，到後來，不但是自己遭到滅亡，並且造成了梁、唐、晉、漢、周五代叔世的衰風」。

葉氏不僅說明了詩與文化興衰的關係，而且也證實了詩與民族國家隆替存亡，有着相關的因素。誠然是：詩是文化的重心，是政情的徵候。因此我們認為要宏揚一個時代的文化，要鼓盪一個國家民族的靈魂，倡導發揚蹈厲的詩篇，自然是不可忽視的要務了！

三、詩與詩教

如何才可以倡導發揚蹈厲的詩篇，使之扶掖文化邁向恢宏之境？簡單的說：便是要倡導詩教。詩的功能是可以感人的，然而詩的風尚卻有時而偏。六朝時代，如晉之阮籍、嵇康、劉宋之謝靈運、謝惠連；蕭齊之任昉、范雲等，蕭梁的沈約、徐陵、庾信等。他們的詩何嘗不都極有造詣，但是他們的詩底風尚，卻都是以華美之句，寫靡靡之音！迨到陳後主在清樂中造了玉樹後庭花曲，而與幸臣們譜製歌詞，既綺麗相高，便極其輕蕩！就由於這些淫靡之聲，結果把六朝的時代，都在很短暫的時光中斷送了！因此詩的寫作固然應當鼓勵、提倡；但詩的風尚卻更須扶持、端正。孔子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之所以歷幾千年而猶為一切詩的宗法者，便在於此。至於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以兼之矣。」這也就是離騷這部書之所以震鑠古今的道理。所謂「以美人香草之思，寓忠君愛國之志」，其辭雖也典麗有餘，其意則確實深厚無窮了！我們為使詩能循着這一正確的途徑去發展，於是便有推行「詩教」的必要。教之以詩義，教之以騷旨，在這兩大目標之下，去管領這一時代的詩壇，那末雅正溫厚之章，自然會源源滾滾不舍晝夜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我國素重詩教，漢時便以「溫柔敦厚」的詩教相尚。若羅敷《贊歌》的「聽婦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羽林郎中的「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能踰。」以及蔡琰的悲憤詩，無名詩的孔雀

東南飛等，都是充分發揮了「詩教」的精神。至於古詩十九首中，那更多東漢末葉大亂時代，夫婦分離，家庭隔絕的別恨鄉愁和相思之苦的深切反映。如「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涉江采芙蓉」中的「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庭中有奇樹」中的「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明月何皎皎」中的「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以及「迢迢牽牛星」中的「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根據近人劉大杰的看法，以為「這都是描寫離恨窮愁的傑作，後人幾無有出其右者。孔子所說、『思無邪！』以及『溫柔敦厚』的詩教，在這些作品裏算是實踐了」。由此可見漢時對於詩教的崇尚。漢賦是最發達的，但班固說過：「賦者，古詩之流也。」劉勰也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者也。」可見漢賦同是承受著「詩教」的蘊藉而發揚的。因其如此，故能不論在西漢時期的文事武功，有着恢宏滂沛的成就；即在東漢時代的文章氣節，也有着深厚嚴謹的規模。綜合看起來，兩漢文化實是以仰承三代之遺風，而加以變化，而其所以有此創獲，崇尚詩教實應為其主要的因素了。

以上是我們就兩漢詩賦融化了詩教的要義，所造成文化上的成就。我們如果進一步去推究，「詩教」的重要任務，不只是扶正一個時代的詩底風尚；而尤其要在「溫柔敦厚」之旨，去培養和發揚詩人的品格，也可以說就是發揚詩人的精神。憑此再去感染一代的士風與民氣，來共同振興這一代的文化。像蘇子卿的堅貞，陳子昂的高遠，王維、孟浩然的冲淡，李白、王昌齡的超絕，杜甫、白居易的仁慈，陸游、辛棄疾的忠愛，當這些千古卓絕的詩人底精神，彌撒到文化化的領域中去的時候，它對於這個時代文化的助長新生，該將發生何等的效益，自是可以想見的。

總之，要使一個時代詩人的精神和他的作品，能够鼓盪這個時代的文化，必須詩人的精神和他的作品與「溫柔敦厚」的詩教相為結合，才能有濟。往事斑斑，是資證驗。那末當着一個時代的文化已淪到式微之際，我們如必要將它復興起來；可循的途徑，不就是要宏揚這個時期的詩教麼？

四、揚詩教，興文化

誰都承認，我中華民族的文化，到今天已陷入衰落的時期。因其如此，所以 總統在前年 國父百年誕辰之日，宣

示了要挽救我中華民族的危機，必須首先要復興我中華民族的文化大業！而兩年以來，我全國上下，莫不遵從這一偉大的指示向前邁進，行見我國文化，將指日而升，這是可以預期的；但無可諱言的，在今天的文化氣層上，尚非常缺乏溫柔敦厚的成分。由現代文化氣層中所彌撤到當前社會面上的種種形象，還少不了乖戾與澆薄的揭露。這種情況，我們只要靜心從各方面去體察，一定可以發現。假如一面讓這種乖戾與澆薄的現象繼續存在於今天，一面要把復興文化的任務澈底完成，那是永遠矛盾，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惟有將詩的溫柔來化除世的乖戾，將詩的敦厚來消滅時俗的澆薄；然後中華民族的文化，才能在人倫、教化之上復興起來！先王原是以詩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這便是詩教的目的。惟有憑詩的力量將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感染到如此境地，那末這一個國家的文化，那有不復興之理？而且詩經中更有所謂「變詩」毛詩有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又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孔穎達正義中便這樣解釋：

「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已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覩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

由上觀之，「變詩」之作，正所以來風刺並匡正一個時代的人倫、刑政的闕失，故當着今日乖戾與澆薄之風猶遺留在我們中興基地的時候，我們豈能不急起直追，以發揮「變詩」之旨，來憑溫柔敦厚的詩教，以弭乖戾澆薄之偷風呢？果能如此，則人倫立見敦厚，刑政立見溫和；換句話說：我國傳統文化之復興發揚，自在於是了。

要復興文化，必須宏揚詩教，這含義，我們在上面已經作了簡單的說明；但是要宏揚詩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今日究應如來宏揚詩教？謹提出下面幾點意見：

1. 屬於作家及其寫作方面的

詩的寫作，自然是詩人情意的反映，也自然就是詩人風格或者精神的發揚，而詩的教義，既以溫柔敦厚爲本；那末詩人的情意，或者風格和精神，就必定須與溫柔敦厚之旨相融會。因此，他寫出來的篇章，才會與我國傳統文化相證

發，才會和我們當前文化相表裏，而相與領導着我國家民族的文化大纛邁向復興之道。今天，我們國內外的詩家仍是人才濟濟，極盛一時；而且大多數人都懷於時代的非常，而一同努力於中興鼓吹，盡心盡力的發揮了詩人的風格或者精神，在詩史的發展上，這種現象自然是極其難得的！但我們無可諱言的，免不了也仍然有人在吟風弄月，剪綠裁紅，大寫其色情之作；有人更在勻脂敷粉，諂媚阿諛，傾吐其功利之情。這些都是纖薄之篇，自然失卻了敦厚之義。因此我們切盼詩人們共同相約，當我國家處在今天的非常境遇，我們必須珍惜着點滴心聲，使它都能譜出我們民族的靈性，不放過短小篇幅，使它都能激發我們民族的巨潮。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關西大漢用銅琶鐵板來唱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我們一切不需要由十七、八歲女孩用紅牙檀板來唱楊柳岸曉風殘月。我們要用全國詩人的血與力，將溫柔敦厚的精義注入我們的文化領域，使之向上，使之復興，這便是我們今日的詩人們所共同負有的使命。爲了達成這一使命，我們更提出幾點建議：

甲：團結詩人：將目前國內若干詩人聯誼會及詩社結合起來，在政府有計劃的輔導之下，成立全國性詩人團體，定期研究詩學，積極寫作詩篇，樹立起詩苑中欣欣向榮的氣象。

乙：出版詩刊：出版全國性定期詩刊，選刊闡明詩教、宏揚文化的詩篇，大量向國內外宣傳，以轉移士風，扶正世俗。

丙：創辦樂院：中國古詩如詩經、樂府、近體詩，宋詞、元曲、都無不可入樂，唐之旗亭畫壁，以及宋之有井水的鄉村都將柳詞唱的故事，這是詩人們所熟悉的。因此我覺得今天我們詩人們所寫的詩篇，只是在騷人墨客唇邊吟詠，眼中欣賞；而沒有將它選入樂章，被諸管絃，因此詩的影響範圍就太狹窄了！反之，今天許多歌樓、酒店、電視機畔、播音機裏，所發出來的時代歌曲，幾乎多是不合詩教，無關宏旨的靡靡之音，當我政府正推行文化復興的時候，何以會獨讓這股風氣無限制的瀰漫？因此我建議政府從速籌設一個音樂院，有如漢之樂府，唐之教坊，宗之大晟府一樣，精選全國詩人所寫的詩篇，由音樂院來譜成樂曲，任憑文人學子，戰士英雄，酒女歌伶，販夫走卒，在其中精選隨興入唱。最近黃友棣先生的歸來，對於民族風格的音樂，起了大規模的鼓盪

作用。友棣先生並帶回去了我贈給他的拙作「四照花室曲稿」，頃來信說：將在拙作中選到幾首譜成樂章，讓大家去歌詠。假如政府能在短期內將國立音樂院設立起來，以友棣先生爲我的拙作製譜爲起點，將全國詩人與音樂界結合起來，一面寫出了民族性靈的大詩章，一面也吼出了時代心聲的大樂曲，那末中華民族的文化，立可在這些抑揚頓挫的節拍裏日新又新，記得去年韓國國立音樂院曾經來我國訪問，很盼望在不久的將來也應有一個國立音樂院去報聘！

2. 屬於詩籍的整理與加強閱讀方面的

自詩經、楚辭以後，每個時代的詩集，累積至今，真是浩如烟海！附著詩集的，如詩人評傳，詩品、詩話、也是連篇累牘，浩瀚無垠。其中適合當前需要，也就是合乎詩教之旨的固然很多，應該淘汰的自亦不少。孔子爲了使詩經能達到思無邪的境界，故將三千首詩刪成三百五篇；今天我們似乎也應該依據詩教的指標，將西漢以來的詩篇，詩人評傳及詩品詩話等，由政府責成前面所擬的組成全國詩人團體去重加刪編，以完成一部今天我們所需要的詩的總集，以爲詩教的重心所繫。而爲便利學者的研究，我們更可以視學者的程度，分別編成若干選集，用今注今釋的方法，加以精密的說明與烘托，以增加其瞭解、領會，而變化其氣質。至若將詩加以朗誦，製成錄音帶或灌成唱片、使機關、團體、學校、家庭，在消閒時加以傳播，從其旋律與聲調裏來轉變一個人的心性，這也是大有功於詩教的發揚的。記得去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施文林先生來臺，曾邀我朗誦詞十五章，曲十五章，製成錄音帶帶了回去，尤其是蔣慰堂、夏煥新、王洮先生等爲政大中文研究所灌製崑曲唱片，施先生也帶回去了全份。我想美國今天的風氣，乖戾澆薄，較諸我國勝過十倍，如果我們能有計劃的將我國的詩、詞、曲朗誦灌音，大量的傾銷到美國各學校及學術團體，當美國今天對我國文學風起雲湧的去鑽心研究的時候，這些錄音帶必爲他們所熱烈歡迎。憑此來宣揚我國文化，匡正美國時俗，這種收穫是如何具有價值呢？

以上是我們盱衡今日的世局，同時在復興我國文化之號召下，應該如何宏揚我們的詩教，以應時需的幾點意見，簡單說來，就是要揚詩教，興文化，不外一面要使詩人的風格崇高化，作品詩教化，而且要與音樂結合爲一，以發揮詩的

功效，一面要整理詩的總集，分編詩的選集，灌製朗詠唱片，以樹立詩教的中心，擴展詩教的影響。這幾點建議雖未必很完善，但假如我們能劍及履及的將這幾點首先實現，以後再隨時加以補充，那末宏揚詩教的目的必可達到，而復興文化的大任，自亦可樂觀歟成了。

結語

復興我國文化，原是千頭萬緒，要全盤做到，自屬很難，但如果有一粗疏，便又影響全體。况夫詩，他乃是高居六經之首，可見它的精義，是貫串着我國書、易、禮、樂及春秋，也就是我國古代一切典章文物的中樞。所以在復興文化的大業上，我們雖然不能點滴做到；但如果能將詩教發揚起來，也就是能先將文化的中樞堅強的樹起。那末這棵文化之樹的枝葉扶疎，欣欣向榮，自可拭目而待了。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正屆滿三週年，我們預祝在明年此日當這一偉大的運動屆滿四週年之期，這棵文化之樹，已盤根錯節照入世人的眼簾！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於木柵

明天理滅人欲辨

趙雅博

筆者在「研究孔孟思想之幾點觀察」（見孔孟學報十二期）一文中，曾說過：「研究誰的思想，就應該是誰的思想，而不該張冠李戴，移花接木」，這是研究任何人的思想，最起碼而且最基本應具有的態度，在註解古人思想時，更沒有例外。但這並不是說，不許我們有自己的思想，也不許我們發揮光大古人的思想，而是說在研究或註解古人思想時，既然說是某人某人的思想，就該真是某人某人的思想，萬不可假他人思想之名，而發揮自己主張之實，而作托古改制的打算，這是厚誣古人，是要不得的作法。

|朱子「明天理，滅人欲」（一般人多作存天理去人欲，與語類原文不符）的名言，在筆者初與它接觸時，便對它有些懷疑，俟後更經深思冥慮，愈益發覺它不特在意義上，不太妥切，並且還是誤解儒學的基本與精華，不足為後世訓。試看朱子對他這兩句話的自信與期許：他說：「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而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多末大的口氣，多末自負的言語，他這不是明明在說：古聖先賢，全部思想，全部主張，全部教訓，全部真理，以及吾人的全部行為，都包括在這短短的六字訣內嗎？

現在我們再看他所以如此主張的理由：「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澱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澱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個明底物事在這裡，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裡，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裡」。（朱子語類卷十二）。

首先，我們要肯定，如果朱子是自己這樣主張自己的學說，我們則只能站在哲學上作批評，但是如果站在是註解儒

家全部學說呢，我們還要從他誤解儒家或至少誤解某個儒家說起。

在本文內，我們要從兩面討論：第一是這兩句話的六字訣不足以包括儒家全部精華，而是誤註古儒思想。其次就是這六字訣的本身的哲理含括，也是有違真理，而不足以爲萬世法。現在我們爲了行文的清楚，爲了使我們容易瞭解，我們先將這六字訣的原意，稍加指點，並使我們以後的立論，有個根據。

明天理滅人欲的真義

我們先釋明一下明天理。

明字說文作朙，照也從月問。鄭玄說：照臨四方之謂明；又有顯著之意，中庸說：明則著；管子《宙合篇》說，見察謂之明；又左傳疏明允篤誠則謂：明達也；大學在明明德註說：顯明其至德。朱子的明天理的明字，其用意與上述的意義，不會有什麼區別，而更着重恢復、使明的意義上。

至論天理的意義，我們從朱子的書中，也可以窺得清楚。一般說來，宋明的理學家，是以天地之道爲天理。天理一面是天地萬物之理，一面是人自己的理，人的理就是人性。朱子就是這樣的主張。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全上），又朱子引程伊州先生的話說：「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又各有一個理」（全上），「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全上卷五）。「惟其理有許多，故物有許多」（全上卷九十四）。

這些話，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天地有一個總原理，即自然之理，也就是永恆或自然律，這個稱之爲永恆或自然律的天理，又名太極，應如西文之以楷書書之，表明它是一個總原理：請再看朱子的話：「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致……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只是個表德」（全上卷九十四），是最高的原理，是統攝一切的原理，太極也就是天理，是事事物物的最高的總原理，但也是事事物物自己的原理，自己的定律，朱子不是